



# 两汉文论新释

——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

王守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汉文论新释

——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

王守雪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汉文论新释: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王守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004-9926-8

I. ①两…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汉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4474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进入 21 世纪以来，徐复观思想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渐成热点，一批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这批专著多在著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从不同学科人手对徐复观思想开展了不同视角的专题研究，对推进徐复观思想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徐复观思想研究，也就成为一个有待探索的新问题。王守雪教授的新著《两汉文论新释——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一个突出的特点与优点，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守雪自师从胡晓明教授读博士生起，就开始着力研究徐复观文学思想，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著《人心与文学：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一书，由郑州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出版。为了使这一研究工作继续深入下去，他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又来到武汉大学，与我合作进行博士后研究。在博士后研究中，他所思考、所探讨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如何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他于 2008 年完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两汉思想的文学视域——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的研究》，就是环绕这一中心点艰苦思考、勤奋钻研、努

力探索的结果。在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基础上，他又经过两年多的认真修订补充，终于完成了这部新著。

在这部新著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之际，我作为守雪的合作导师，同时作为徐复观思想的研究者和这部新著的第一个读者，除了表达自己的欣喜与祝贺外，还想结合这部专著，从徐复观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谈谈自己的一点思考与感想。希望这些思考与感想，能为读者诸君进入这部新著，起一点引导的作用。

### 一 徐复观思想研究中的两种方法

在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学派中，徐复观在学术上与其师熊十力、与其友唐君毅、牟宗三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他不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来讲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对中国思想历史的“现代的疏释”来讲自己的思想。用他的话说：“我所致力的是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在我心目中，中国文化的新生，远比个人哲学的建立更为重要。”<sup>①</sup>这样一来，就使得徐复观思想的文本，与熊十力诸师友的文本相比，呈现出很大的特殊性。如何看待徐复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著述，从这些文本出发来开展徐复观思想研究，就有一个阐释文本方法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唯独徐复观思想研究才有的，但对于徐复观思想研究来说却尤为重要。

在中国古代以经学为框架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阐释文本方法。借用今天的话说，“我注六经”是文本解读者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阐释活动，所强调的是这种阐释必须

<sup>①</sup> 引自林镇国等《擎起这把香火——当代思想的俯视》，《徐复观杂文续集》，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10页。

以文本的内容为根据和框架，而不是以文本解读者的己意为根据和框架；“六经注我”则是文本解读者以文本为自己思想创造启示的阐释活动，所凸显的是文本解读者对文本的思想的活用和转化，而不是拘泥于文本的内容与原意。这两种阐释文本的方法，固然看似相反，但实也相成。一些学养深厚、思想深刻、懂得方法论的学者，也会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这两种方法兼而有之、有机结合的运用，在文本注释上体现了“我注六经”的方法，在体系建构上又体现了“六经注我”的方法。

对于徐复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著述，所要采用的阐释文本方法，当然不必受这种古代的经学阐释方法的限制。但即使是现代的阐释文本方法，也总是存在着类似“我注六经”的方法与类似“六经注我”的方法的区分，以及这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因此，我觉得可以借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套式，来说明徐复观思想研究中的阐释文本方法问题。由于徐复观是通过对中国思想历史的“现代的疏释”来讲自己的思想，因此在已有的徐复观思想研究中，研究者们往往采用类似“我注六经”的阐释文本方法，对他的这些“现代的疏释”加以认真的清理与阐释，以求得对他的思想做出准确的了解与把握；没有这种清理与阐释、了解与把握，这一研究是难以真正开展的。但若要对徐复观思想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又必须穿透他的这些“现代的疏释”，吸取其中所蕴含的有启发性的思想内核，这又需要采用类似“六经注我”的阐释文本方法，以求得对徐复观思想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没有这种穿透与吸取、深化与拓展，这一研究是难以持续推进的。当然，这两种阐释文本方法也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运用，或者两种方法各有所用，或者两种方法一主一辅。

从这一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守雪这些年的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可

以发现他在文本阐释方法上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他的第一部专著《人心与文学：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明显地带有类似“我注六经”的特点；而他的这一部新著《两汉文论新释——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则明显地带有类似“六经注我”的特点。当然，守雪在书中并没有提出类似“我注六经”或类似“六经注我”的阐释文本方法问题，这是我自己的思考与感想。但守雪在这部新著的绪论中强调了“笔者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并指出：“本书抽引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研究的文学端绪，综合比较近代以来两汉文论研究的得失，重新梳理两汉文论的思想史线索，试图做一些‘接续生长’的工作。”在我看来，他在这里所说的“解释的方法”，固然保留了类似“我注六经”的阐释文本方法，但主要还是指类似“六经注我”的阐释文本方法，这两者是综合运用、有机结合的，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则从前者出发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这种方法的更新，显示出守雪经过自己的艰苦思考、勤奋钻研、努力探索，对如何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徐复观思想研究这一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 二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的两重意义

4 在这部新著中，守雪把自己开展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上。而两汉思想史研究，正是徐复观开展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徐复观开展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所在。在这方面，徐复观经历了长期的思考与探索，留下了大量的研究性著述。

徐复观对汉代思想史的关注与探讨，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轨迹还没有由政治转入学术的时候。早在1943年，他就写过一篇研究西汉盐铁政策的文章，并受到熊十力的欣赏和赞扬。这篇文章大概是徐复观最早

发表的学术研究文字，但今天已经难以找到，只是在当年熊十力给徐复观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的信息。熊十力在信中说：“大文极有见地，且甚细密，可喜。……大文议论，吾完全赞同，但材料恐更须留意采集。弘羊、孔僮之徒，确有大功。而弘羊尤精于计，武帝不用弘羊，决不能北却强胡，西南广拓疆土。吾子谓其持法严，与当时推行政策有关，尤为前人所不能道。此文确有重大价值，但有难为今人言者。国营的办法，非急合而不为私利之官吏，则无法举行。又统制之办法，非官吏精白乃心，处处为国家与社会着想，而但为私利着想，则必有国与民俱毙之焉。年来统制之行，益增人民之苦，此可深长思也。汉人毕竟有一公字在胸中，所以做得好耳。”<sup>①</sup>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熊十力、徐复观师徒二人都关注汉代思想史，并在西汉盐铁政策上有大体一致的认识，这种关注与共识出自于他们对现时代的感受和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立场。

1949年，徐复观由中国大陆移迁台湾，并开始进入学术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他写了几篇关于两汉思想史的文章，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等。这些文章反映了徐复观对两汉思想史的进一步思考，但并未成为他的研究重心。他这时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以先秦思想史为重心的，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等名著相继问世，产生很大影响。但正是通过先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为徐复观以后转入两汉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条件和前提。可以说，他是从先秦思想史研究而进入两汉思想史研究的。也正是这样，他在以后的两汉思想史研究中，往往将两汉思想史与

<sup>①</sup> 熊十力：《答徐复观》，《熊十力全集》第8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熊十力全集》编者注：“此函有月日而无年，据推测，可能写于一九四三年。”



先秦思想史加以比较，以揭示汉代思想史的特点、性格及意义。

徐复观真正对两汉思想史做出开拓性的专门研究，是他晚年在香港执教时期。1969年，他由台湾定居香港后，把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重心移到两汉思想史。20世纪70年代，他完成了三大卷、百万言的《两汉思想史》，卷一论汉代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卷二论汉代哲学思想，卷三论汉代史学思想，对汉代思想历史作了深入细致、别开生面的阐发。《两汉思想史》成为徐复观最厚重的学术专著，也是20世纪两汉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此外，徐复观还著有《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二书，论及汉代经学思想；著有《西汉文学论略》、《陆机文赋疏释》等文，论及汉代文学思想。上述这些著述，共同构成了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他原本还计划写作《两汉思想史》卷四，专论汉代经学思想，已经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但由于癌症不治，未能动笔，终成遗憾。对于徐复观的汉代思想史研究，一些现代新儒学学者曾给予高度评价，蔡仁厚认为：“两汉思想的研究，最能显示徐先生学术研究的功力”<sup>①</sup>；刘述先亦说：“最能代表他的学术价值的还是他晚年的‘两汉思想史’研究”<sup>②</sup>。

对于在晚年开展两汉思想史研究的动因，徐复观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有过说明。他说：“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局格，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作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一般人视为与汉学相对立的宋明理学，也承继了汉

① 蔡仁厚：《徐复观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67页。

② 刘述先：《研究程朱鞠躬尽瘁》，《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第505页。

儒所完成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对天人性命的追求，实亦顺承汉儒所追求的方向。治中国思想史，若仅着眼到先秦而忽视两汉，则在‘史’的把握上，实系重大的缺憾。何况乾嘉时代的学者们，在精神、面貌、气象、规模上，与汉儒天壤悬隔，却大张‘汉学’之帜，以与宋儒相抗。于是两汉的学术思想，因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而反为之隐晦。我以流离琐尾的余年，治举世禁忌不为之旧学，也有一番用心所在。”<sup>①</sup>在他看来，汉代思想是继先秦思想之后中国思想开展的又一个关键时期，深刻影响了以后二千年中国思想历史，而清代考据学家打着“汉学”的旗帜抗衡“宋学”，实背离和遮蔽了汉代思想的真实精神风貌，正是这样，他在晚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一既重要又困难的工作，希望以此为后学者开启进入两汉思想史研究之门。

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构成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首要的意义，无疑在于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对汉代思想历史作了全面深入的“现代的疏释”。在这一疏释中，他从汉代的社会历史生活入手，探寻汉代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对汉代哲学、史学、经学、文学诸思想予以深入阐发，对汉代思想的特点与性格、内涵与外延、贡献与局限予以了富有历史感的说明，使汉代思想史在中国思想史中鲜明地凸显出来。进一步的意义，则在于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包含了对汉代思想历史的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衡论，实表达了他自己的思想。例如，徐复观曾谈到对汉代思想历史的总体理解，指出：“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所以我开始写《两汉思想史》

<sup>①</sup>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版，自序，第1页。

时，先想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维，将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色，需要安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始易著明。”<sup>①</sup>“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一种大的演变。演变的根源，应当求之于政治、社会。尤以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确立，及平民氏姓的完成，为我国尔后历史演变的重大关键，亦为把握我国两千年历史问题的重大关键。”<sup>②</sup>透过这些关于汉代思想历史的衡论，可以直接感触到徐复观思想的活生生的跃动，以及由此所体现的思想的力度、深度与广度。因此他的这些衡论，不仅对研究汉代思想历史有意义与价值，而且对研究与汉代思想史相关的其他学术史亦有借鉴与启示。

这样一来，要深入探讨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就要关注对这两重意义的掘发。尤其是后一重意义的掘发，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的研究更为重要。守雪的这部新著，正是以此为着眼点的。这就是他在书中绪论中所说：“本书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检别参考近代以来关于两汉文论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汉代文论的思想史线索，进一步探讨两汉文论的现代身份、功能与研究方法等问题。”也就是说，他的这部新著，是以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为借鉴和启示，进而对汉代文学史作出反思和新释。立基于此，再来看守雪在这部新著中对阐释文本方法的选择，其思路也就更为清楚明白了。

### 三 从思想史研究走向文学史研究

守雪在这部新著中，既以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为借鉴和启示，进

<sup>①</sup>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三版改名自序，第1页。

<sup>②</sup>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自序，第1页。

而对汉代文学史作出反思和新释，那么在这两者之间，还需要有一个由思想史向文学史的转换。因为思想史与文学史，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毕竟分属于史学与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特点。而这种转换工作，需要有特殊的路径，需要做专门的研究，需要进行一种转化性的阐释。换言之，在这里不仅需要采用类似“六经注我”的阐释文本方法，而且需要具体地做好从思想史向文学史的转换，否则只会是对方法的空谈。

在这部新著中，守雪敏锐地把握到这一方法论问题，自觉地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他在书中的绪论中指出：“本书所论‘文学视域’，背后便有笔者一个文学观念的世界；徐复观对两汉思想史的解释，背后又有他的一个‘视界’；涉及的学者、思想家，也有这些学者、思想家的‘视界’。在这三者之间，要实现‘视界’的融合，同时发现历史的真实及其意义、价值，确实是研究方法的关键。”这就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工作重心，在于具体地做好从思想史向文学史的转换，并把这种转换贯穿于全书之中。通观全书，正文共七章，分论《淮南子》、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王充，都是以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为借鉴和启示，进而对汉代文学史的这些重要环节作出反思和新释，具体地展开了从思想史研究走向文学史研究的径路。

例如，在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中，董仲舒是以公羊学者和大哲学家的身份出现的，获得了同情的理解和重要的位置。徐复观指出，董仲舒最重要的思想贡献在于：“把阴阳四时五行的气，认定是天的具体内容，伸向学术、政治、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学大系统，以形成汉代思想的特性。可以说，在董仲舒以前，汉初思想，大概是传承先秦思想的局格，不易举出它作为‘汉代思想’的特性。汉代思想的

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sup>①</sup>但董仲舒思想对于汉代文学的影响问题，在徐复观那里未能专门论及，而在守雪这里则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守雪指出，董仲舒所完成的“天的哲学大系统”，对汉代思想具有笼罩意义，其影响亦及于文学；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从精神方向、思想内容、表达形式等方面，对奏议文章的发达具有重要的启示；董仲舒传《春秋》公羊学，直接影响了向他问学的司马迁，这是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这样一来，守雪就对董仲舒对于汉代文学的影响，予以了有理有据的专门说明。

又如，在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中，对司马相如作过深入的探讨，在两汉思想史中给予了这位文学家以突出的位置。徐复观说：“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纪录的司马相如的生活形态，是一个典型地伟大文学家的生活形态。伟大地文学家，常有一颗高贵地追求自由之心，突破世俗拘虚之见，以舒展他所追求的事物。……《文心雕龙·体性篇》说他的性格是‘傲诞’，他看透了世俗，他对世俗加以鄙视，他的态度便不期傲诞而自然傲诞，傲诞是出自他不能抑制的一颗自由之心。”<sup>②</sup>对于徐复观的这一论断，守雪予以了肯定，但同时又提出问题：“相如的‘一颗自由之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恐怕不是单纯由先天性格所致；在他的作品中，如何呈现出此种精神？不能不加以进一步的分疏。先贤时人于此，亦有提及，然而多是轻描淡写，甚至还有一些曲解，尤须加以澄清。”这就回到了汉代文学的本身，进而把这颗“自由之心”落实为“赋家之心”，把“赋家之心”在汉代文学史上凸显出来，使人们看到了司马相如作为文学家的真精神与真性格。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第296页。

② 徐复观：《西汉文学论略》，《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371—372页。

再如，在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中，对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视为汉代精神的真正体现者。对于司马迁所著《史记》的文学价值，在历史上似乎并不乏积极评价，但徐复观却十分不认可这些评价。他指出：“此书之见重，始自韩愈以下的古文家，至明归震川、清方望溪而特著。然据凌稚隆《史记评林》所录，仅摭掇于字句之间，不由史之内容以领会文之奇茂，既不关系于史，实亦无与于文。方望溪虽以‘义法’一词，绾史与文而一之。然其所谓义法，卑陋胶固，不仅无当于史，实亦无当于文。则此书虽以文而见重，然率皆皮傅细节、买椟还珠之类。”<sup>①</sup>守雪认为，徐复观所进行的批评和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振聋发聩；但如果将这些问题的脉络中加以疏理或作进一步研究，则不容易看出前人认识的障蔽，不容易显示《史记》的文学意义；至于徐复观立说的语境及存在的问题，如对于古文家的过分批评，更有辨明之必要。因此，守雪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专论司马迁，指出《史记》实为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学融为一体的伟大成就，司马迁创作实践中表现出的“义法”，更为中国文学确定了基本原则和方向。

这些例子清楚表明，守雪在这部新著中，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对做好从思想史向文学史的转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正是通过这种工夫与探索，守雪成功地由思想史研究走向了文学史研究，以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论为借鉴和启示，对汉代文学史作出了反思和新释。这对于已有的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富有新意的深化与拓展。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守雪虽在这部新著中采用了类似“六经注我”的阐释文本方法来开展研究，但却始终抱持着一种尊敬前贤、虚怀治学的态度。在书中结语的最后一段，他写道：“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对

<sup>①</sup>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06页。

两汉思想所作的‘现代的疏释’，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对两汉文学思想的疏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徐复观截断众流，将两汉思想与之后两千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一体，表现出极大的眼光，不如此，则不能显示中国文化的特性与丰富内容之上的价值。他对两汉思想坚实的考证与细致的疏释，更表现出一个思想史家的学术人格与巨大成就。本书是他所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以及文学意义的进一步显发。他对一些思想家的文学成就疏释不足，他对一些问题表现出的偏颇见解或疏误，可以在更大的学术语境中得到通达的理解。”我想，守雪之所以能在这部新著中，采用新的方法，作出创新性的研究，正是与这种态度直接相关联的。若没有这种态度，固然不能“我注六经”，同样也不能“六经注我”，因为在这两种方法中，“我”都离不开前人撰著的“六经”。守雪的态度说明，他自觉地把握了这一关联。而有此一自觉，与无此一自觉，是大不一样的。正是这样，我期待着守雪在徐复观思想研究中有更新的开拓和更好的收获！

李维武

2011年7月26日于武汉大学

# 目 录

序 .....	(1)
绪论 .....	(1)
第一章 《淮南子》：“道”、“事”兼举 .....	(11)
一 “辩博善为文辞”的淮南王 .....	(11)
1. 刘安传世的作品 .....	(11)
2. “刘氏之书”与诸子思想的整合 .....	(17)
3. 刘安的思想 .....	(22)
二 《淮南子》中的“道”与“事” .....	(26)
1. “道”论：从本体论到历史哲学 .....	(26)
2. “事”论：《春秋》精神的折射 .....	(30)
3. 道、事兼举与中国文论范式 .....	(33)
第二章 董仲舒：天人合一 .....	(42)
一 《贤良对策》与政论传统的建立 .....	(42)
1. 儒家文化方向的确立 .....	(43)
2. 儒生论政与“言天征人” .....	(45)



3. 历史意识与“以古验今” .....	(47)
二 天人合一思想隐含的文论因素 .....	(50)
1. 关于阴阳五行学说的解释 .....	(51)
2. 天地精神与创作观念 .....	(53)
3. “气”观念向文学的渗入 .....	(58)
三 董氏《春秋》学的文学意义 .....	(63)
1. 董氏的《春秋》学 .....	(63)
2. 《春秋》精神的再解释 .....	(65)
3. 《春秋》与“辞” .....	(69)
<b>第三章 司马相如：赋家之心</b> .....	(74)
一 汉赋：多重思想文化之结晶 .....	(75)
1. 赋与“诗” .....	(75)
2. 汉赋与楚辞、楚赋 .....	(79)
3. 赋的分类及思想意义 .....	(83)
二 司马相如与汉赋精神 .....	(87)
1. 文化心灵之表现 .....	(88)
2. 文化意识之发展 .....	(90)
3. 专制政治对汉赋的局限 .....	(96)
三 “赋心”说 .....	(99)
<b>第四章 司马迁：发愤为作</b> .....	(106)
一 从孔子、董仲舒到司马迁 .....	(107)
1. 司马迁的作史动机 .....	(107)
2. 司马迁的文化精神 .....	(109)